

## 【国外马克思主义】

# “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探析

周 岳

**【摘 要】**“人类世资本主义”是指“人类世”时代的资本积累活动急剧加速,扩大“物质变换裂缝”以至于逾越“行星边界”、引发严重生态危机乃至诸多领域复合型危机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化石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和“灾难资本主义”三种形态。三者相互交织,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生态崩溃的根源。要阻止“人类世资本主义”继续侵蚀人类自由发展的基础,必须依靠“环境无产阶级”领导生态革命,实现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战略愿景。在对“人类世资本主义”理论展开生态批判的过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层结构和理论内涵得以丰富。然而,该理论同样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亟需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予以回应。

**【关键词】**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环境无产阶级;生态革命;生态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周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24.1.102~11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基础、传承与贡献研究”(2022JZDZ007);天津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协同创新中心重点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教育——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的研究”(JJ-SZKZ202313002)。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为因素影响下的地表和大气成分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的演化进程,继之而诱发的全球变暖、海水污染、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也变得愈加严峻。因此,科学界提议以“人类世”(Anthropocene)定义这个人类在地质学与生态学方面起到中心作用的时代<sup>①</sup>。值此背景下,当代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于2010年首次提出“人类世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理论,意指人类未来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背后隐匿的巨大资本积累引擎的威胁,这种威胁在当下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冲突<sup>②</sup>。自此,“人类世资本主义”受到生态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广泛关注。从2015年开始,福斯特相继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世危机》等文章,昭示着自身理论研究的“人类世转向”<sup>③</sup>。受福斯特的影响,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出版了《面向人类

世:化石资本主义与地球系统的危机》,在批判性地反思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基础上,系统阐释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人类世的马克思:价值、物质变换裂缝与非笛卡尔二元论》一文中更是直接强调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域正是“如何理解人类世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sup>④</sup>。2019年起,福斯特接连发表了《人类世的帝国主义》《人类世的资本主义:生态毁灭还是生态革命》以及《人类世的采掘主义》<sup>⑤</sup>等一系列著述,斋藤幸平亦先后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人类世的“资本论”》和《人类世的马克思:迈向去增长的共产主义思想》。通过这些著述,福斯特等学者在揭批资本主义的生态责任的同时,建构性地擘画出了应对“人类世”生态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战略愿景。至此,规范性意义上的“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逐步建构起来,并引发国外学界的研究热潮。国内学界

对这一议题研究的起步则相对较晚。《人类世帝国主义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原理基础上,强调“人类世帝国主义”是“人类世资本主义”的实质,并借此进一步深化了福斯特等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sup>⑥</sup>。随之,国内学者从生成背景、现实表征、具体观点、历史意义及超越路径等多个维度出发对这一议题展开论述<sup>⑦</sup>。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学界对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较为分散,而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为视角对这一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更是匮乏,尚不能揭窠“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发展的全貌。鉴于此,本文意在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视角对“人类世资本主义”这一议题展开全面、系统且深层次的研究,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对其理论价值及限度展开评论与反思。

### 一、理论提出:“人类世资本主义”的话语建构与内涵阐释

福斯特等学者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对“人类世”生态危机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从而定义了“人类世资本主义”——“人类世”时代的资本积累活动急剧加速,扩大“物质变换裂缝”以至于逾越“行星边界”<sup>⑧</sup>、引发严重生态危机乃至诸多领域复合型危机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一)“人类世资本主义”的话语建构

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人类世”描述的是“人类活动的痕迹完全覆盖整个地球表面的时代”,这昭示着人类活动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地球的存在境况,人类正日益成为影响地球系统的主要力量。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大高潮”<sup>⑨</sup>,其通过影响地质系统制造并加速“行星边界”崩溃,带来气候异常、海水污染、生物灭绝等“人类世”生态危机,进而致使人类陷入全球生态灾难的泥淖。学者们展开讨论并得出初步结论:“人类世资本主义”本质上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对整个地球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等的窃据进程。借此,他们诉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分析资本逻辑如何操纵并寄生于其中的全球环境灾变体系内部的矛盾运行机

制,从而揭示生态矛盾运动的规律并探寻分析矛盾自身变化的方法。

其一,对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承继式发展。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思想是“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核心依据。福斯特曾概述过“自然界的普遍物质变换”“社会物质变换”和“物质变换裂缝”三个概念,并重点关注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物质变换”,强调人类必须“治愈物质变换裂缝并构建社会自由的新领域”<sup>⑩</sup>。继之,安格斯重点分析了“物质变换”在“时间”维度上的“断裂”,指出“资本时间”作为“对快速生产、销售和获取利润的需求”,与“自然时间”这一“数百万年发展起来的地球系统循环过程”之间存在矛盾,必然致使“资本时间压倒自然时间,产生物质变换裂缝”<sup>⑪</sup>。斋藤幸平则参考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思想来深入分析“人类世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并批判性地指出了技术性、空间性、时间性三种类型的物质变换裂缝转嫁方法的共同弊端,即都会将环境的负面影响不断转嫁给边缘地区,进而致使这些地区同时面对“饱受生态帝国主义掠夺之苦”和“被迫承受不平等的、由转嫁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的双重负担<sup>⑫</sup>。

其二,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运用。福斯特等学者强调,唯有重塑社会主义理想,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的意识”,方能有效应对“人类世”生态危机<sup>⑬</sup>。基于此,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去增长共产主义”(Degrowth Communism)方案,即去除资本主导的积累和经济增长至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马克思在摒弃进步主义历史观后,试图将从非西欧、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中总结出的可持续性和稳态经济原则纳入自身的变革理论之中,进而推动其转变成与“生产力至上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去增长共产主义”方案。借此,他们总结道:“去增长共产主义”才是克服“人类世”生态危机的最佳途径,其可以提高人类在“人类世”时代生存下去的可能<sup>⑭</sup>。

其三,对马克思“不平等交换”思想的镜鉴式学

习。马克思认识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过程与自然物质条件之间的矛盾,并将其解释为“质量价值问题”与“数量价值问题”。其中,“不平等生态交换”(Unequal Ecological Exchange)主要涉及与使用价值有关的“质量价值问题”。据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展开更为系统的生态批判,将对地球的掠夺称作对“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并强调这一“破坏”与“不平等交换”有关<sup>⑮</sup>。福斯特等学者发展了马克思的“不平等交换”思想,并表示“不平等生态交换”是指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发达国家,利用其不对称的自然资源转移能力与环境成本外化能力,从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攫取生态价值及其他剩余价值的行为,其基础是“以更少的资源获得更多的生态使用价值”,集中反映了将“人类世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体系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而带来的生态劣势。

## (二)“人类世资本主义”的内涵阐释

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酿成当前“人类世”生态危机局势的罪魁祸首正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或全球化资本主义”<sup>⑯</sup>。由此,“人类世资本主义”描述的即是在“人类世”时代,不断加速运转的资本积累活动继续强化对全球自然界的控制、压榨和破坏力度,进而造成更为严峻的生态危机乃至诸多领域危机交织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学者们从现象、关系与未来三个角度具体地界定了这一概念。

其一,“人类世资本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大高潮”所引致的“人类世”生态危机频发现象。自“资本主义大高潮”以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和军事体系的崛起不仅带来了围绕能源的侵略甚至战争,还为本世纪的人类带来一场“可居住性危机”(Habitability Crisis)。福斯特等学者认为,“人类世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资本追求无限的价值增殖”和“地球的资源却是有限的”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的力量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同样也是“人类世”生态危机的症结所在。事实上,目前正在发展中的“气候异常”等问题不过是“人类世”生态危机的典型案例而已。“人类世资本主义”正在逐步跨越“九个行星边界”,已然成为引发全球性物质变换裂缝的直

接诱因<sup>⑰</sup>。

其二,“人类世资本主义”体现出当代资本与自然之间更为严重、更全方位的矛盾对立关系。马克思曾详细描述过资本活动引发的物质变换裂缝及其背后所隐匿的“掠夺”自然的现实。鉴于此,福斯特等学者从两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矛盾与马克思时代的不同之处。一方面,矛盾的严重程度更深。福斯特等学者将其定义为足以毁灭星球上一切物种的“人类世裂缝”: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经济活动不经意地跨越或已经跨越地球系统的边界,进而污染了自己的“巢穴”,并威胁着要摧毁地球这一人类和无数物种赖以生存的安全家园<sup>⑱</sup>。另一方面,矛盾的影响范围更广。马克思时代的生态危机还是局限性的,但“人类世资本主义”通过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所制造出的生态危机却是全球性和全方位的,其严重地干扰到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需要。

其三,“人类世资本主义”昭示着“要么是生态毁灭、要么是生态革命”的未来<sup>⑲</sup>。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人类的未来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表现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与地球生态系统本身发生冲突。由于“资本主义大高潮”出现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构建”,因此我们必须以社会科学为指导来组织并开展一场生态革命。具体而言,生态革命不能简单视为对“资本主义大高潮”带来的巨大生态挑战的技术或现代化的回应。相反,它需要朝着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改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国家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借此完成向实质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社会形态的转型。

总之,福斯特等学者在“人类世”生态危机逐步显现的背景下,借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

## 二、核心内容:“人类世资本主义”的三种表现形态

“人类世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其获取剩余价值的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化石资本主义”(Fossil Capitalism)、“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和“灾难资本主义”(Catastrophe Capitalism)三种形态。

(一)“技术性转嫁”：“化石资本主义”的持续积累和扩张搅乱生态秩序

“技术性转嫁”(Technological Shift)是指以技术发展转嫁生态成本的“人类世”危机解决方式。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与化石燃料的历史密不可分。在资本不断积累和扩张的过程中,“人类世资本主义”形成了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化石燃料消费基础上的“化石资本主义”形态,并通过一系列“技术性转嫁”引发了化石能源战争和环境种族主义等问题,借此搅乱了生态秩序<sup>①</sup>。

其一,持续积累与化石燃料消耗密不可分。化石燃料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人类世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经济增长即是通过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实现的。化石燃料的持续性使用以及对自然的残酷性压榨,致使非常规化石燃料的开采量剧增,成为推动地球系统进入“人类世”的加速器。基于此,“人类世”资本家希冀通过技术创新转嫁生态危机、弥合生态循环中的“裂缝”。譬如现代农业在以消耗有限的“氮”等化石资源代替原先使用的土壤养分的过程中,实际上忽视了化石资源的“技术性转嫁”存在搅乱土壤生态系统的隐患,最终引发了远比土壤耗竭规模更大的环境问题。同时,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工业化使用同样促使资本积累突破了自然节律、地理空间和社会组织的限制,进而为“人类世资本主义”打开经济增长的“阀门”。显然,“人类世资本主义”的“技术性转嫁”并不能有效解决生态问题,技术滥用反而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并将二者之间本就“无法弥补的裂缝”扩大至全球范围,最终致使资本主义“无法存续”<sup>②</sup>。

其二,环境军国主义发动化石燃料战争,并将“人类世”生态危机的直接受害者视作“人类世资本主义”的敌人。“化石燃料战争”的主要战线是明确的:第一,直接战线集中在石化资源丰富的中东及其周边地区。“人类世资本主义”的主要利益集团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化石燃料资源的开采力度来解决常规原油储量下降的问题。第二,间接战线是“想要燃烧更多化石燃料的人”与“想要燃烧更少化石燃料的人”之间爆发的一场新兴的化石燃料战争。第三,蓬勃发展的气候运动则是一条“转变中的战线”。由于

受到来自新的非常规能源的威胁,该运动的重心已从减少对碳燃料需求的应对举措,转变为将化石燃料留在地下的应对战略。第四,胜利的关键在于组建“生态大众阵线”。福斯特等学者指出,“反对化石燃料工业的斗争”才是“生态大众阵线”的基础,即只有开展全面的生态和社会革命,才能创建一个可持续性的社会,继之恢复生态体系的正常秩序<sup>③</sup>。

其三,“人类世资本主义”的“技术性转嫁”同样推动形成了环境种族主义。第一,“化石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更加不均衡,并为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带去更大风险,进而致使其沦为“技术性转嫁”的主要受害者。其间,数亿人面临营养不良、水资源短缺等难题,“99%的天气灾害伤亡事件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75%的受害者是女性”,在干旱年份出生的儿童中“有41%至72%的可能性会出现不可逆转的发育不良症状”<sup>④</sup>。第二,“技术性转嫁”带来的气候异常等问题大部分是在种族主义及其排斥政策共同驱动作用下形成的,这些政策深深根植于“化石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之中。在安格斯看来,化石资本如若不受控制,便会周而复始地搅乱正常的生态秩序,并推动全球环境迈向“种族灭绝主义”的历史性阶段<sup>⑤</sup>。第三,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和社会经济动荡非但没有激发出全球化石资本集团的国际合作与创新精神,反而可能促使其与广大无产者隔绝开来,以确保自身能够持续获取并积累财富。这些即是“人类世资本主义”进行“技术性转嫁”所隐含的灭绝主义和隔离统治的残酷法则。

(二)“空间性转嫁”：“生态帝国主义”以“不平等生态交换”掠夺剩余价值

“空间性转嫁”(Spatial Shift)是指将生态负担从世界经济中心地区转移至外围地区的“人类世”危机解决方式。这种利于中心地区国家的方案推动形成了“生态帝国主义”形态,其以“不平等生态交换”为基础谋求剩余价值,进而扩大“人类世裂缝”。即便中心地区已经将“人类世裂缝”及其危害转嫁至外围地区,但实际上“人类世裂缝”只是通过长途贸易等方式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加深,进而致使可持续的物

质循环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鉴于此,福斯特等学者从自然资源的国际流向出发探讨了“不平等生态交换”的重要特征。

其一,不对称性转移。“不平等生态交换”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从世界经济外围地区向核心发达经济体的净转移,以及据此形成的更大的“物质足迹”(Material Footprint)。一方面,中心地区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高额资本积累,不惜利用所谓“世界工业重新布局”的契机,将社会、自然成本转嫁至外围地区。由此,外围地区的生态空间不仅被视为自然资源的“供应库”,还被日益用作“废物储存库”<sup>⑤</sup>。另一方面,福斯特等学者将“不平等生态交换”定位于不对称转移的能源和原料,认为其生产潜力主要通过世界经济强国的进出口中心来实现。在他们看来,“不对称性是不平等交换和剥削的本质”,但由于这种不对称性为自由市场交换的经济表现所遮蔽,因此需要详细区分出世界贸易中的经济类别。显然,正是由于“人类世资本主义”所内嵌的罔顾生态成本的发展思维,中心地区才会将生态成本不对称地转移至外围地区,故而“人类世”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理应由前者承担。

其二,成本外部化。世界经济中心地区正是通过“出口垂直流动”的不平等交换机制将环境成本“外部化”给外围地区,进而加速其境内的环境退化趋势,并带来诸多“负外部性”危害<sup>⑥</sup>。具体而言,一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程度加深。中心地区为实现资本积累和利润攫取,不惜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处理废料,同时将有毒废料转嫁至外围地区,其结果是给这些贫困的附庸国造成巨大的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损失,以及更高层面上的社会秩序混乱和政治合法性丧失等。二是经济价值的转移被复杂的物质生态流动掩盖,从而改变了城市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态关系。外围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出口不仅涉及经济价值,还牵涉能源和物质价值向中心地区的纵向流动,这使得负债累累的外围地区不仅面临着资本对自己领土上的“自然界馈赠”的肆意掠夺,还要担负起资源开采所带来的高昂生态成本<sup>⑦</sup>。三是方式的隐蔽化。即使成本外化对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足以威胁到地球所有物种赖以

生存的栖息地,但“这种影响往往会被忽视”,根源在于中心地区的发达国家仍然按照自身意志“塑造”自然界,将发展代价和生产成本外化给边缘地区,以推动其自然掠夺行为的合法化。

其三,发展不均衡性。“不平等生态交换”同样会反向加剧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一是南北国家的不均衡。“不平等生态交换”涉及南北国家间物质和能量的不均衡性转移,极大地加深了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一般而言,由于南方国家的出口价格相较于北方国家的持续下跌,北方国家往往具备更占优势的贸易条件,而南方国家扩大自然资源的出口生产不过是为了维持目前的进口水平,这势必形成南方国家边界内广泛的环境退化趋向<sup>⑧</sup>。二是贫富国家的不均衡。“不平等生态交换”造成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富裕国家无度索取并消耗资源但受环境污染影响相对较小,而贫困国家人均资源损耗不多却频繁滋生诸如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居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指数下降等问题。究其根源,这是由于富裕国家在享受因自然资源消耗而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顺利地将环境污染转移至贫困国家,进而严重践踏了“穷人和穷国生态、健康、安全等基本权利”,并最终致使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出现严重的发展不均衡现象。三是生态危机责任承担机制的不均衡。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人类世”时代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下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故而在反思气候正义时需要我们“考虑阶级、种族和性别构成的等级制度”<sup>⑨</sup>。显然,对“人类世”生态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应该是生活在北方国家的高收入人群,其将生态危机的后果不平等地转嫁给缺乏财政和技术支持的南方国家。

(三)“时间性转嫁”：“灾难资本主义”利用“人类世”生态危机牟利

“时间性转嫁”(Temporal Shift)是指利用“自然时间”与“资本时间”之间的时间差以攫取利润的“人类世”危机解决方式。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这一解决方式的直接弊端是推动形成了“灾难资本主义”形态。据此,他们以“灾难资本主义”解释并批判了“人类世资本主义”无休止地加速资本积累、压榨自然的

现象,并表示这些现象正在融合为一场全球风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灾难性积聚”(Accumulation of Catastrophe)。福斯特等学者在“人类世”生态危机持续恶化过程中提出“灾难性积聚”概念,意指“灾难的可能性及其严重性的愈益积聚”,并表示当前的人类活动使得地球的多个边界遭受威胁,全球局势正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推向灾难性的境地<sup>⑧</sup>。虽然“自然时间”与“资本时间”之间的时间差并不会立即带来生态灾难,但以新自由主义政商财团为核心的“灾难资本家”却可以利用自然作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实现对广大无产者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压榨。通常而言,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不会立即带来气候崩溃,所以“灾难资本家”往往会利用这一时间差所带来的机会,从之前的钻探和管道投资中攫取更多利润<sup>⑨</sup>。显然,这种“灾难性积聚”的自然破坏力度要远远超过自然生命系统的修复速度,其结果必然是将环境成本转移至子孙后代,进而导致灾难的普遍化和持续化。因此,除非彻底挣脱“人类世资本主义”的束缚,否则人类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全球性灾难,甚至是走向灭亡。

其二,从“灾难”中牟取掠夺性收益。福斯特等学者指出,“人类世资本主义”不仅造成全球性变化,更有可能通过“海洋掠夺”(Ocean Grabbing)等获取掠夺性收益并带来灾难性后果。一方面,“灾难资本家”试图通过不断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如水力压裂、地质工程、转基因生物、碳交易和自然灾害保险等,继续从当前的“人类世”生态危机中获利,然而中心地区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掠夺,因此“灾难资本家”对于所谓“绿色经济增长”的一味追求必然造成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掠夺力度的急遽加剧<sup>⑩</sup>。另一方面,“灾难资本家”不仅会不择手段,将“人类世”生态危机视作掠夺更多财富的“商业机会”,还会裹挟国家保护特权阶级的利益,以严格控制那些威胁正常秩序的环境弱势群体及难民,譬如对北美原住民栖息地实施“定点污染”,逼迫其交出祖地和沦为“社会贱民”等等。

其三,利用“灾难”制造“休克”效应。“休克主义”是指借着“灾难”造成的“社会休克”状态而推行激进

的、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sup>⑪</sup>。这种“休克”效应最典型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休克主义”(Climate Change Shock Doctrine),即利用“气候危机”人为制造“稀缺性”来增进资本的商业机会以牟利的“灾难资本主义”策略。福斯特等学者批判这种人为制造“稀缺性”的行径所带来的破坏和浪费正从根本上影响地球的物质变换进程,并表示如若不对其加以改变,势必将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造成灾难性影响。二是“新冠休克主义”(COVID-19 Shock Doctrine)。既然“人类世资本主义”能够通过制造“稀缺性”来制造更多贫困,那么对其本身而言,甚至连新冠疫情这般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公共卫生危机都可被视为直接牟取暴利的大好机会<sup>⑫</sup>。即便疫情危机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人遭受痛苦,“人类世资本主义”仍将发挥其适应任何自然境况的韧性,“继续寻找获利机会,直到最后一刻……这就是‘人类世’时代的终点”。显然,“人类世资本主义”利用“灾难”所制造出的“休克”效应,在带来阶级分化的同时,也彻底摧毁了资本主义文明所塑造的自由与民主的神圣形象。

总之,“人类世资本主义”的三种表现形态相互交织,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生态崩溃的根源。其中,“化石资本主义”作为“人类世资本主义”的技术性转嫁媒介,推动着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能源消耗,从而加速了气候崩溃和环境破坏的进程。“生态帝国主义”通过全球化的方式,将生态破坏的成本转嫁至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不平等和不稳定,本质上充当了“人类世资本主义”的空间性转嫁桥梁。“灾难资本主义”则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货币化等处理方式来应对自然灾害和环境灾难,并将灾难视为经济增长和利润攫取的源泉,更进一步地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成为“人类世资本主义”的时间性转嫁途径。显然,“人类世资本主义”的三种表现形态共同作用,推动着资本主义体系对自然世界的剥削与破坏,继之诱使“人类世”生态危机全面爆发。

### 三、基本对策:以“生态革命”对抗“人类世资本主义”

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要阻止“人类世资本主

义”继续侵蚀人类自由发展的基础,必须坚持“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 Proletariat)的领导,反对与资本扩张相关的生态退化和社会剥削,建立广泛的、统一的无产阶级联盟,并在“以革命性的方式加速社会环境转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以实现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战略愿景<sup>⑤</sup>。

#### (一)依靠“环境无产阶级”斗争重夺生态霸权

面对当前迫在眉睫的“人类世”生态危机,人们应从分析和批判“人类世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和反人道本性出发,展开一场致力于推进生态可持续性和实质性平等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然而,在“资本主义大高潮”下推行这样一场生态和社会革命“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必须将“环境无产阶级”定位为反资本主义生态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并充分发挥其革命主体性作用,以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参与。

其一,坚定依靠“环境无产阶级”斗争引领革命性生态变革。福斯特等学者表示,“资本主义大高潮”之后的人类未来发展图景有赖于一个新的“环境无产阶级”在全球的崛起。“环境无产阶级”具有群众基础广泛、斗争性强等优势,足以担负起领导生态革命、重塑生态“裂缝”,进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同时,鉴于“人类世”生态危机可能造成人类灭绝的可怕后果,且“环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关联,故而存在联合反抗“资本主义的灭绝主义”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通过集体斗争,有望形成一个全新的、更可持续的、实质上平等的世界秩序,继之创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态文明”<sup>⑥</sup>。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一方面,“环境无产阶级”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和社会主义原则开展生态革命。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不存在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真正的生态革命,也不存在非生态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环境无产阶级”应充分认识到生态与资本积累之间固有的根本矛盾,进而矢志于创建一个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性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共同体。另一方面,“环境无产阶

级”必须坚持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推动在“人类世”生态危机斗争中所产生的“新的生态唯物主义”与“旧的基于阶级的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交相融合。同时,还应保持多元化,对绿色左翼中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

其三,与时俱进地培育并宣传公正平等的生态社会意识。对于“环境无产阶级”而言,一是需要培育建立在对整个人类甚至其他物种的认同之上的“物种意识”(Species Consciousness),实现人类生态意识的整体性提升<sup>⑦</sup>。二是在揭批“人类世资本主义”环境非正义性的基础上,宣扬具有坚实精神内核的“实质性平等文化”(Culture of Substantive Equality),强化生态与社会反霸权组织建设;同时借鉴传统的工人阶级斗争,形塑并铸牢生态共同体意识。三是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新的科学知识以完善生态社会主义计划,并及时将环境议题转化为政治议题,继之推动生态革命运动的方向转变,即从实现环境正义转向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红色新政<sup>⑧</sup>。

其四,践行人民运动路线,建立契合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原则的“生态统一战线”,以促进实现广泛的社会联合。第一,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本身与争取环境正义的斗争密不可分,“环境无产阶级”必须发挥自身优势,组建与领导好“生态统一战线”,并积极开展以捍卫人类生存为中心目标的环境斗争。第二,全球性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一场“将从无数灭绝运动解放出来的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的运动”,故而应当充分调动工人、农民、无地者和失业者等人类社会中最受压迫的群体参与进来<sup>⑨</sup>。第三,“环境无产阶级”还应坚持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原则,彻底超越“不平等生态交换”秩序下的“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e Lebensweise),并主动探寻不同国家、地域之间的“团结的生活方式”,以共同应对成本外化、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继之实现社会的全面生态化转型。

#### (二)实现“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具体战略

除了主张依靠“环境无产阶级”斗争重夺生态霸权,福斯特等学者又明确提出实现“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生产资料集体所

有且对于社会平等与正义有迫切的追求;二是建立、维护并不断改进具有良好生态效应的社会工业基础。鉴于此,他们从“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两个维度具体规划了实现“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构想战略图景。

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对抗“人类世资本主义”的结局,必然是走向“去增长共产主义”,即向公平、可持续的“去增长型的后资本主义”转型,以确定人类“既能保留自由、平等、民主,又能获得生存下去的最后机会”<sup>⑩</sup>。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实现“社会主义”维度的“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其一,摆脱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向重视“使用价值”(有用性)生产的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的意义根本不在于物质标准的提高,而在于利润率的提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本积累的提高。这与增加人们的物质福利是不一样的”<sup>⑪</sup>。显然,“人类世资本主义”的首要目标即是追求价值增殖,相对而言无视“使用价值”、商品质量和环境负担,以及维系社会再生产所真正需要的资源。与之相反,“去增长共产主义”将生产置于社会性计划之中,并以“使用价值”而非“价值”的增长作为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继而从根本上消弭了因(资本主导的)价值增殖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在他们看来,“去增长共产主义”必须彻底摆脱现有的消费主义,转而生产真正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

其二,缩短劳动时间,提升生活质量。缩短劳动时间是转向“使用价值”经济生产的基本条件。“人类世资本主义”目前正带来一场划时代的经济和环境危机,一方面表现为资本的过度积累、经济停滞和“地球的金融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每个生态子系统内部以及整个地球层面的物质变换裂缝<sup>⑫</sup>。因此,若要创建一个生态可持续和实质性平等的社会,就必须推翻这种人为刺激增长、经济浪费和极端不平等的非理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从根本上减少从事无意义的、只为创造有“价值”的工作的劳动时间,并且摒弃“能源回报率”高的化石燃料而使用可再生能源等,如此才能成功地将世界从资本逻辑所制造的生态灾难的边缘拯救回来。

其三,废除分工,恢复劳动力创造性,推动形成新的再分配体系。福斯特等学者秉承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恢复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首先需要“废除分工”,继而方能设计出便于人们从事多类型劳动的生产领域。在他们看来,必须将社会剩余大幅转向真正的人类需求和生态可持续性发展,而非“利润体系产生的巨大的生产跑步机”<sup>⑬</sup>。换言之,不仅要增加劳动以外从事休闲活动的自由时间,还要消除劳动时间内的痛苦,更要积极地将劳动转变成具有创造性的、可以实现自我的活动。

其四,推进生产过程民主化,有计划地放缓经济速度。一方面,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大高潮”,作为“公共财富”(Public Wealth)的生产资料理应受到民主化管理,即在生产中应该开发什么技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等都应该由更为开放的民主讨论所决定。同时,必须将生产权力转移至相关生产者,使其可以兼顾自身发展的合理需求与自然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以创建一个适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此外,鉴于当前的地球生态紧急状况,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创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球之间的新的生态关系,并将资源大量转移到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简言之,“去增长共产主义”所追求的生产过程民主化将改变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这种经济模式关注“行星边界”,同时强调重视经济平等、扩大社会保障和增加休闲时间等。另一方面,福斯特等学者还明确强调:“如果目前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那么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机会避免突破世界气候预算,这将带来全球性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当前需要紧急限制富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向下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sup>⑭</sup>。诚然,这一“去增长”方案虽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经济减速,但却能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同时,为应对“人类世”生态危机提供充足的空间。借此,生产的民主化和经济减速将有助于弥合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继之创建一个自由、平等和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其五,重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基本工作。要实现“去增长共产主义”,还必须推动社会产业结构完

成从重视以男性为主的制造业到重视被纳入社会计划之中的护理、教育、艺术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转型。毋庸讳言,“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加注重“使用价值”的生产,能够从根本上改造劳动,超越剥削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并带来经济减速以弱化其对环境负面影响。然而,为防止“劳动密集型行业”本身的服务质量(“使用价值”)的下降,务必杜绝因追逐利润(“价值”)而过度追求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做法。

福斯特等学者还详细阐述了“生态革命”的基本策略,作为对抗“人类世资本主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生态文明”维度的具象化表达。其一,在能源使用方面,需要“停止化石燃料的燃烧与排放”,迅速淘汰化石燃料能源结构,从而结束自工业革命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能源体制,并代之以太阳能和风能等可持续的替代型清洁能源。其二,在农业发展方面,以可持续小农场和农民种植为基础,提高每英亩粮食生产率,同时将破坏性的、能源和化学品密集型的农业综合企业的单一化栽培生产转变为生态农业的集体化生产。其三,在交通运输方面,通过建立高效且免费的公共交通网络,将住宅、社区和工作中心连接起来,同时采取措施减少社会对私人汽车的依赖。其四,在工业生产方面,重组生产以打破当前以资本积累为导向并遵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理念的资本主义商品链;发展更合理、更公平、更集体且更少浪费的生产形式。与此同时,制订并严格遵照绿色建筑指导方案,鼓励并推广绿色建筑,必要时将工业生产置于公共控制之下,并向所有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居民提供全面的再培训服务。其五,在军事方面,大规模削减军费开支,以腾出经济盈余用于生态改造,并严格控制有毒化学品的排放。其六,在社会生活方面,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并推广“零废物系统”(Zero Waste Systems)等以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组织当地社区(包括原住民社区)一起参与全球生态系统的修复;严格限制企业开展具有环境破坏性的消费者营销活动;普及高质量的包括节育在内的保健服务等。其七,在生态援助方面,改编武装部队为志愿小组以负责修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并援救受自然灾害

侵袭的原住民;禁止淡水资源私有化,对海洋公地施加强有力的管理以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再造林、低碳种植等森林草场修复方案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方案,及时有效地保护濒危物种<sup>⑤</sup>。

总之,为了对抗“人类世资本主义”并实现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福斯特等学者主张通过“环境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生态革命的实施,逐步建立起一个新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

#### 四、理论效应:对“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科学评析

在对“人类世资本主义”议题展开生态批判的过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层结构和理论内涵得以丰富,有益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现状,进而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鉴。

##### (一)“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价值

其一,为认识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提供新视角,反映出当代西方左翼对于全球生态问题的持续关注。第一,“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在深度时间语境中理解现时生态灾难的视角,不仅是反思全球资本主义的突破口,也是重新审视当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新契机。第二,“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断裂的事实,意味着人类活动正以毁灭性的方式影响自然界,这为我们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审视“人类世”的自然开辟了理论空间。第三,“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既反映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愈发意识到人为驱动因素对于地球“行星边界”的扩张起着加速作用,又体现了资本主义确实已经将地球生态系统推向灾难边缘的事实,并据此警示人们如果“资本主义仍然像以往一样运作”,世界就会深陷一个不益于维系人类文明稳定性的困境<sup>⑥</sup>。这些均启发我们必须摒弃以追求阶级利益为唯一目标的“人类世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其二,为反思增长的极限提供新思路,体现出当代西方左翼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益探索。第一,“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为我们正视现

有的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机遇,帮助我们意识到无休止地追求“绿色经济增长”的“人类世资本主义”模式才是扩大贫富差距、制造愈益严峻的“人类世”生态危机的根源。第二,“去增长”昭示着与资本主义和增长主义的直接对抗,其强调将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料归于社会全体人民占有,这在尊重地球生态限制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了组织经济发展和分配社会财富的方式。第三,“去增长”更多关注质的发展,认为主要应由人民自身来决定生产和消费的优先项,以满足其在食物、住房和基本服务等方面的真正需求,进而有助于人们探寻到基于团结、民主、平等和尊重地球的价值观的全新的生活方式。

其三,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鉴,坚定了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第一,“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对于“私人财富”(Private Riches)的批判及其与“公共财富”的区分,有效地揭示出自然资源私有化无法解决生态弊病的关键所在,启示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坚定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第二,“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揭示了防范“人类世”生态危机并在系统观念视阈下加强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人类世”生态危机不仅指向单面的环境问题,更指代全局性的社会危机,必须以整体性思维审视之,以防陷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图囿。第三,“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气候异常等问题的阐发昭示着世界各国合力应对“人类世”生态危机的现实必要性,启示我们应当反思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固有的霸权思维,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积极倡导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国际话语权<sup>④7</sup>。

## (二)“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限度

“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同样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局限性,折射出当代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现实困境。

其一,“人类世”这一核心概念存在疑问。人类是否真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可以用“人类

世”命名当前这一地质时期?这种将这个时期概括为“人类世”的说法引起了西方左翼学者的诸多质疑。第一,质疑“人类世”概念内含“物种崇拜”的危险性,即指摘这一概念存在将问题还原至人类的本质活动进而摒弃社会关系的倾向。在他们看来,“人类世”将人类定位为可以决定整个地球命运的主宰者,无形之中肯定了人类的绝对主导地位,让人类产生一种自己是“普罗米修斯式的高级物种”的感觉,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自我神化行为。第二,质疑“人类世”忽视人类最基本的历史特性。美国环境史学界新锐学者詹森·W.摩尔(Jason W. Moore)表示,“人类世”概念所强调的“人”并非传统理解意义上的纯粹生命体的人,而是与自然和技术力量紧密相关的人,福斯特等学者将人类视作一个同质的群体,充斥着浓郁的“无差别人类”的政治意涵,本质上忽略了不平等的阶级、种族、国别等差异的影响<sup>④8</sup>。第三,质疑“人类世”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部分西方左翼学者借助尼采的“永恒轮回”(Eternal Recurrence)论和海德格尔的“将来”优先的时间概念,解析出“人类世”概念所赋有的悲观主义色彩,揭示其过分夸大技术的解域化效用,继之疏忽技术带来的负向效应的弊端。在他们看来,“人类世”话语内在包含“一种纯粹机械性的历史因果关系的理念”,而这种机械性关系尚且无法真正诠释置于历史因果关系中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基于此,他们质疑“人类世资本主义”研究者的科技进步乐观论,即坚信科技的不断发展可以使人类未来变得更加美好,并强调这一思维方式将致使人类进一步异化为技术统治者的奴隶和附庸。

其二,理论逻辑本身存有疏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宏观趋向。虽然福斯特等学者所主张的“去增长”为反思增长的极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在本质上仍然忽略了资本、市场以及生产力的作用。一方面,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市场则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生态问题的消解同样诉诸生产力的发展,而福斯特等学者所秉持的“去增长”战略,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心主义与生产力至上主义的全盘否定,较之马克思的经典生产力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偏离。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曾明确提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sup>④</sup>。显然,“去增长”并不意味着断然拒绝增长,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式的“增长主义”,即“为了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计划的经济增长。社会主义不单是统筹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社会制度,更是一种以联合控制生产资料替代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如列宁所言:“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sup>⑤</sup>质言之,不论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还是为了及时且高效地应对自然灾害和各种生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有计划的经济增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和任务,在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的同时,杜绝资本的“野蛮生长”,从而有效地将经济规模控制在地球可承载的阈值之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sup>⑥</sup>。

其三,具体策略带有理想色彩,难以在实践层面付诸实施。第一,在福斯特等学者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建立在社会正义和生态平衡的非货币价值的基础之上,故而在当前资本主义甚嚣尘上的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诸多困难。第二,福斯特等学者宣称“环境无产阶级”可以在施行无差别的阶级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同其他阶级的“和解”,并据此共同完成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资本主义本质上妥协并服务于资本逻辑,“人类世”资本家实际上并未主动采取措施以切实地缓释“人类世”生态危机。不仅如此,在面对“人类世”资本家的暴力镇压之际,“环境无产阶级”尚不能有效领导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全面开展。第三,具体的政治主张既缺乏对社会运动实现主体的深入分析,又缺乏对于推翻“人类世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可行路径的科学探索,因此关于解决“人类世”生态危机的革命性激进方案往往只能停留在理想主义的表面,未能达到彻底改革的目的。

总而言之,“人类世资本主义”是福斯特等学者

从“人类世”的崭新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的理论产物。具体而言,他们对“人类世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反思,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贯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批判精神,不仅对于我们认识“人类世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和反人道本性,以及探寻摆脱“人类世”生态危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等具有重要启益,而且深刻地反映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实质性发展,并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更为多元的智力资源。诚然,“人类世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既具有合理因素,又存在理论逻辑本身有疏漏等不容忽视的内在缺憾,正确认识并科学评价这一理论意义重大。

#### 注释:

①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美国生物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共同指出,地球已经结束了始于117000年前的“全新世”(Holocene),正进入以人类为主导力量的“人类世”(Anthropocene)。参见 Paul J. Crutzen and Eugene F. Stoermer, "How Long Have We Been in the Anthropocene Era? An Editorial Comment," *Climatic Change*, Vol. 61, 2003, pp. 251-257.

②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 28.

③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ism and Ecology," *Monthly Review*, Vol. 67, No. 7, 2015, pp. 1-13;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ism in the Anthropocene: Dialectical Rifts on the Left,"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6, No. 3, 2016, pp. 393-421;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Anthropocene Crisis," *Monthly Review*, Vol. 68, No. 4, 2016, pp. 9-15。

④物质变换裂缝(Metabolic Rift),又译为“新陈代谢断裂”。参见 Kohei Saito,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Value, Metabolic Rift, and the Non-Cartesian Dualism,"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theorie und Philosophie*, Vol. 4, No. 1-2, 2017, pp. 276-295。

⑤John Bellamy Foster, "Extractivism in the Anthropocene," *Monthly Review*, Vol. 75, No. 11, 2024, pp. 1-12.

⑥参见牛田盛:《人类世帝国主义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福斯特对帝国主义的最新批判述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⑦相关研究参见吴冠军:《从人类世到元宇宙——当代资本

主义演化逻辑及其行星效应》，《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5期；徐学通、田月：《人类世批判的辩证生态观阐释》，《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赵睿夫：《“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源起、内容探析与理论评述》，《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徐旭、陈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视域下的人类世责任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年第6期，等等。

⑧“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又称“临界点”(Tipping Point)，由环境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om)及其团队首次提出，旨在量化地球系统无法在稳定的“全新世”状态下继续运行的安全极限，即划定一个不超过地球极限的人类活动的安全范围。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54; [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

⑨“资本主义大高潮”(Great Capitalist Climacteric，又译为“资本主义更年期”)，既代表“行星边界”面临的紧急情况，又代表社会历史转型的必要性，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54; [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

⑩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26, p. 34.

⑪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p. 122–125.

⑫ Kohei Saito,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24–34.

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2页；胡马雍：《南南论坛 | 福斯特×汪晖：灾难资本主义的列宁诊疗方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23710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237102)。

⑭ Kohei Saito,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242; [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136、138、254页。

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⑯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 "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Monthly Review*, Vol. 71, No.

3, 2019, p. 71.

⑰“九个行星边界”分别是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地球化学流动(氮磷循环)”“平流层臭氧消耗”“海洋酸化”“淡水消耗增加”“土地利用变化”“大气中的气溶胶负载”和“化学污染”。参见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p. 73–75.

⑱“人类世裂缝”是“物质变换裂缝”在“人类世”时代的表述。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p. 19–20, p. 249, p. 380;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自然辩证法的回归：为必要的自由而斗争》，周岳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4年第1期。

⑲“生态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或“生态毁灭”(Ecological Ruin)代表着世界人口在“人类世资本主义”背景下面临的新兴的全球革命形势。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33.

⑳“化石资本主义”揭示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化石燃料和资本积累之间的深层共生关系，以及化石资本集团(煤炭、石油行业等)在这种关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参见周岳：《伊恩·安格斯“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评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㉑[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23、111页。

㉒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100–103。

㉓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p. 176–178.

㉔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 15.

㉕[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54页。

㉖“出口垂直流动”是指跨国公司将在碳密集型的产品制造和资源开采工作外包给处于世界经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而北方国家的高消费需求恰好反向推动了南方国家碳密集型产品的进口。由此，“出口垂直流动”有效降低了北方国家的生产型碳排放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北方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逃避减排责任。参见 Andrew K. Jorgenson and Brett Clark, "The

Economy, Military, and 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Panel Study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Nations, 1975–2000," *Social Problems*, Vol. 56, No. 4, 2009, pp. 621–646.

②7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 "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Monthly Review*, Vol. 71, No. 3, 2019, pp. 70–88.

②8 R. Scott Frey, Paul K. Gellert and Harry F. Dahms, *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52, pp. 169–170.

②9 Kohei Saito,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105.

③0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tastrophe," *Monthly Review*, Vol. 63, No. 7, 2011, pp. 1–17;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Renewal of the Socialist Ideal," *Monthly Review*, Vol. 72, No. 4, 2020, pp. 1–13.

③1 Kohei Saito,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31.

③2 Kohei Saito,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127–128; [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

③3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tastrophe," *Monthly Review*, Vol. 63, No. 7, 2011, pp. 1–17.

③4 参见孙亮洁、刘明明:《“新冠资本主义”:基本概念、运作机制、克服对策与理论局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③5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Robbery of Nature: 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Rift*,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p. 102;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366.

③6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33, p. 385.

③7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 "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Monthly Review*, Vol. 71, No. 3, 2019, pp. 70–88.

③8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 219;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The Capitalinian: The First Geological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Monthly Review*, 2021, p. 13.

③9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 "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Monthly Review*, Vol. 71, No. 3, 2019, pp. 70–88;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 440.

④0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314; [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73–74页。

④1 David Schwartzman and Salvatore Engel-Di Mauro, "A Response to Giorgos Kallis' Notions of Socialism and Growth,"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30, No. 3, 2019, pp. 40–51.

④2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65;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Defense of Nature: Resisting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arth," *Monthly Review*, Vol. 73, No. 11, 2022, pp. 1–22; [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④3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66.

④4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65.

④5 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Ruin or Ecologic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2, p. 80, p. 116;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 207; Ian Angus and Simon Butler, *Too Many Peopl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Haymarket Books, 2011, pp. 198–199。

④6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p. 191.

④7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91–294页。

④8 Jason W. Moore,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PM Press, 2016, pp. 154–165.

④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3页。

⑤0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⑤1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70页。